

編者
的話

改革開放二十年對中國宗教界意義深遠

今年十二月，正值已故中國領袖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二十年，追今撫昔，令人感觸良多。

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，可謂衝著時代而來。從大歷史的角度看，歷史上大收之後必有大放，不因個人的好惡而有所改變。出於這個原因，當我們放眼全球時，必會發覺七十年代世界各地相對封閉的國家及社會，都在近二十年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開放。（唯一例外是北韓，但北韓卻正因為其拒絕開放而吃苦不已。）

無可諱言，在為歷史定調的過程中，個人的選擇仍是深具意義的。起碼在影響歷史潮流的節奏及幅度方面，每一個決策人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因此，我們雖不至可以說「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」，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方面的正面價值，在歷史上卻是應該得到肯定的。

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，背後誘因肯定是為了挽救中國共產黨於危難之間，當中也不能否定其匡扶國運的決心。否則，在改革開放中期的「六四事件」，鄧氏就不會口口聲聲要消除「亡黨亡國」的威脅。

無論如何，中國改革開放絕對不會是為了宗教發展而設。然而，中國宗教界的復興，卻著實

受惠於二十年的開放政策。對照於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中國，宗教活動確已逐漸復甦，儘管當中尚有不少問題急待妥善處理；宗教自由誠然未盡如人意；在天主教會方面，與教宗全面共融的問題尚是懸而未決。不過，凡此種種，都不足以否定中國宗教界在二十年來所突顯的活潑氣象。

二十年的改革開放，為社會提供了自由空間，使到「公民社會」重新在中國冒起。宗教界（特別是「政教分離」體制之下者）的成長與萎縮，很大程度上與這「公民社會」空間的休戚相關。

當然，中國宗教界在過往二十年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。當中波濤迭起，反覆進退，皆因在改革開放推出之初，鄧小平只能點出大方向，卻未有提供具體的落實方針。實幹之處，只能「摸著石頭過河」。因此難免著著驚心，處處設防。對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再表示善意，中國政府起初只能以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的懷疑態度來回應。

二十年的經歷，令到中國從「摸著石頭過河」過渡到「走在康莊大道」之上，成為國際上受人注目的一員。箇中的轉變，促使國家領導層能以更大的自信心面向世界，以兼容並蓄的精神處理文化互異的問題。這一點，具體反映在今年教宗邀請段蔭明、徐之玄二司牧到羅馬開會一事上。國家高層雖以二位司牧的手續未清而不願發出護照，但對整件事卻處之泰然，而不加負面的詮釋。這一方面，反映出社會的改革開放，不單帶來具體外部硬體的建設，亦有利於內部「兼容」文化的確立。從這一角度看，改革開放不但有其經濟及政治意義，在文化上亦是一大顯著的進展。

林瑞琪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